



Norman Lebrecht

名字 之歌

T h e S o n g o f N a m e s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著

赵舒静 杜筱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字之歌 / (英) 莱布雷希特(Lebrecht, N.) 著;
赵舒静, 杜筱雪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4
书名原文: The song of names
ISBN 978 - 7 - 5327 - 6083 - 1

I. ①名… II. ①莱… ②赵…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492 号

THE SONG OF NAMES: A HERO LOST, A FRIENDSHIP BETRAYED, A MYSTERY UNSOLVED
By NORMAN LEBRECHT
Copyright © 2002 BY NORMAN LEBREC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1 - 148 号

名字之歌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 著 赵舒静 杜筱雪 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84,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083 - 1/I · 3616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219025

中文版作者序

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已年过半百。人人都说这把年纪是老了点。当这本书获得大名鼎鼎的“惠特布莱德新作奖”（现在叫“柯斯塔文学新作奖”），他们又这么说，还是在报刊新闻里。有些评论尖刻得很。年轻可爱的《卫报》记者对我嗤之以鼻，“皱皱巴巴的老记者，毛衣不成样子，胡子毫无卖点。”

我不爽了？一点都没。创作发表原创故事给全世界看，这种幸福感远超学院派不足挂齿的嫉恨。我为我的年纪自豪。我年老，是因为我蓄势待发。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创作小说，但我一直明白时机未到。写下十二部非小说后，我才觉得是时候看看我的想象是否值得与大众分享了。一旦开始，我就停不下来了。

有次我住在利物浦，旅馆不舒服，我夜不能寐，《名字之歌》就在那晚闪过我的脑际。那夜正逢科威特战争结束，我第二天要从曼彻斯特飞往洛杉矶——我这辈子从没飞那么远过。世道要变，却又有如时光回溯。

回溯到多远呢？回溯到以往的时代，我的时代之前的时代，我最了解的时代。故事就这么来了。

我生于1948年7月，二战的喧嚣已过。母亲在1950年突然离世，三个姐姐将我拉扯成人。她们经历了二战、伦敦被炸，体味了与身处法国纳粹占领区的家人断了音信的那种极度担忧。纵然是个惶恐失落、物资匮乏的时代，儿时的我却明白，死亡的近在咫尺、每个活着的日与夜的真切，都是我再渴望也体会不了的。我来晚了，都错过了。

我觉得受了冷落，这个故事便源于我的执念：两个少年生活在二

战时的伦敦，一个是音乐天才，一个是策划好手。轰炸前后的伦敦街道，我想象得出，因为那是往昔的世界，充斥我想象的世界。

两个少年关系亲密，手足情深。我在孤独中长大，大人忙活上班和结婚这类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找乐子。我会站在园子里的椅子上，自导自演。扮演别人，扮演许多其他角色，比扮演儿时苦闷的自己更有趣味。虚构比熟悉的现实更让我愉快。

投身小说创作的风险在于，我或许会失去安身之所，无处可藏。但结果并无风险。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同于我的他们自己的性格，我创造了他们，却无法控制他们的互动。这部小说是一列失控的火车，有它自己的意志和动力。一旦放开刹车，作为驾驶员的作者只能手足无措地冲下山坡：除了紧抓方向盘，尽量避开障碍物和幼童，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种兴奋莫名的感觉，从那之后我便停不下笔。偶然在十年后再次翻开《名字之歌》，我竟有种不知作者为何人的错觉。岁月荏苒，快得叫人害怕。这部小说捉住了时光中的一瞬，它定了格，永远闪着光。

诺曼·莱布雷希特

致

比阿特丽斯

米丽安

波林

目 录

1 休息时间	1
2 关乎时间	15
3 没时间了	30
4 时间匪徒	45
5 我们的小日子	78
6 时又复时	145
7 还活着	172
8 坦白时分	181
9 报仇时分	208
10 行动时分	219
11 时间到了	230
12 尽在我掌握	238
译后记	263

1 休息时间

身穿双排扣外套，在周一早晨入城的人潮中逆行，让我觉得特别不合时宜。所有的上班族都在往城里涌，我却自讨苦吃地非要往外去。此外，我似乎是这短兵相接的前线阵地上唯一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时代变了，斜纹棉布衫也能穿着去工作了。

或者说是他们所谓的工作。坐在闪烁的屏幕前搜索收集数据，何来的追逐渴求之喜、一击必杀之悦、征服占领之吻？数字化了的所谓的工作中，没有浪漫情怀，没有殊死搏斗。它是虚拟的追求，没有真正的善恶。我的工作却是和人打交道的，所以说差不多过时了。

别来盘问我此行的目的。战争期间，铁路的招贴板上总写着烦人的问题：“您真的有必要旅行吗？”没，还没到让审计员相信的程度——看到微乎其微的那点回报，他们会狠狠地削减我的经费开销。也没法让莱特尔满意，她会疑惑地抬起眉毛，记下我欠她一笔感情债。说实话，我要去的地方既没有一桶金子，也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引起周日卖鞋人的兴趣——当然，我对会计可不会这么说（“我了解消费趋势”），也不会把实话告诉莱特尔（“手头紧张的时候，去会会老面孔很重要。”）关键在于，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对自己不用找借口。有了逃避，或者说幻想逃避，我才能活着，我的公司才能勉强不负债。

生存的本能驱使我穿过尤斯顿的人潮，来到 903 城际快车上预留的一等座。我的心跳得不是一般的快，我荒唐地期待冒险。说荒唐，是因为之前的旅行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对冒险的任何期待还没萌发出来就胎死腹中了，因为我天生保守拘谨，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不会太遥远的葬礼上，这些品质肯定会被提及，不光如此，敬爱的逝者

还是一名音乐专家,有犀利的幽默感和低调的慈善心。

无论怎么说,“冒险”这个词都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冒险。动脉脂肪沉积和对导管手术的恐惧对我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健身俱乐部的游泳池,我只能游三个来回;电动脚踏车,我只能骑半英里;要竭力避免兴奋状态;夫妻生活罕有,有也得像豪猪一样谨慎。“照顾好你自己”是和莱特尔分别时她说的话,为了她,我会努力。虽然婚姻的激情不复存在,这一点我至少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就连这颗鼓噪作响、还没搭桥的衰老心脏,也会因为幻想离别而澎湃起来。登上火车,在无谓的期待中,我的脉搏加速了百分之十。我气喘吁吁地朝前望去,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就好像在周六晚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集锦,可你其实已经在电台里知道了比赛结果。你也许能从这个节目中看到表现和技巧层面的闪光点,可但凡提前知道了确切的结果,紧张感就会荡然无存。

坐在舒适豪华、装饰派风格的扶椅里看过时的球赛,我能受的刺激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对于我这个被培养出来干大事的人而言,还真是又悲哀又失落的境遇。从幕后推手变成了观众,从大舞台的侧翼到了高扶手的观众椅,真是悲哀。不过,也不是全无好处。退居二线后,我在做小生意的圈子里被戴上了“永远的智者”的光环。

一生的小心谨慎终有回报。我的别墅带室内温水泳池;我在缺德的索价过高的瑞士度假酒店享受冬夏;我的养老金安排结构合理,足够我舒舒服服地过上三辈子。先知以赛亚^①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我们把它当作宗族的励志名言。世上还有比钞票轻轻的沙沙声更让人心安气定的东西吗?

^① 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预言家。

在“扶轮社”^①和“圣约之子会”^②，你看不出我和其他会员有什么区别。我喜欢的就是这点；据我所知，其他的弟兄们既没有资质过人的，也没有先天不足的。忘了我说过这种话吧，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被问及过得如何时，我的父亲会说：“没啥抱怨。”我也一样。普通日子是我的极乐世界。唯有心中，内心深处，在无可弥补的失落的心结之处，我才感到需要作一次“不必要的”旅行，免得我想得越多就越钻牛角尖，也免得我遗传来的动脉硬化日趋严重。

如果说铁路大多数情况下的服务对象是我这样的人——永远失魂落魄、魂不附体的家伙们，我可不会觉得惊讶。我能看到发展部的主任在董事会议上一拍脑袋就想出来个主意。“我们为什么不增开周一早上去荒郊野岭的班次呢？”他轻松地提议。“肯定有数不清死沉的废品、烟头和不知在等什么、急着想离开的人。”

在靠窗的位子坐定，我取出两片药，一片是知名品牌的镇静剂，一片是温和的缓释剂，然后闭上眼睛做十分钟的“瑜伽式冥想”。我在哈利街的健康顾问（是心脏病专家，不是做自然疗法的那个）建议我每天锻炼，避免情绪激动。我向来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谨慎饮食，还随身携带肾脏捐献的卡片。如果我瞧见窈窕佳人或警察捉贼，我就把头扭开。在米其林星级餐馆里，我只点清蒸鱼。我朋友众多，但近些日子没有情人；我说不清有哪些爱好，但并不热衷于驾车。

我的生活伴侣莱特尔有她自己的生活。她骨架大、胃口好，并不热心公益，却能代表市里打桥牌。桥牌是她三十多岁时学会的，是生完孩子以后的事了。在这项娱乐中，她的超强记忆和过人天资有了舞台。莱特尔能记得我们参加过的吃炸鸡排的所有婚宴的座位安排、女王加

① 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

②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犹太人服务组织，旨在为犹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活动。

冕礼的仪式顺序、元素周期表的通用符号，还能记得让英格兰队首次在家主场失利(3:6)的匈牙利队的全体阵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女王加冕礼的那年，也是我们结婚的那年。我不止一次地力劝，让她用惊人的记忆力做点更有价值的事，而不是对着一叠纸牌。不过，莱特尔不大受得了为忍饥挨饿之人和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免费午餐的女士。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是私立教育和美满婚姻的成功典范。一个是伦敦肯辛顿的产科医生，老婆年轻貌美；另一个是诽谤罪律师，老婆贤良淑德。吃饭时，我宁可听律师低级趣味的闲言碎语，也不想听堕胎医生的伪善之辞。周五晚上，我们围桌吃饭，被要命的多元饱和脂肪撑得呻吟不止，假装家庭和睦，其乐融融。我老婆不费心思、味同毒药的饭菜，我没扒几口就消化不良，先行撤退。端一杯甘菊茶，拿一份《旁观者》，上床——这是伴随我一辈子的习惯。咖啡是在大厅里喝。他们狐疑地接受我的道歉。我怀疑家里的某些人会觉得我根本没病，而是得了慢性疑病症。

在这样的列车上，想要像样地发发呆实在太难了——它随着乱七八糟的信号灯一会儿启动，一会儿晃荡，然后像一匹脱缰的马在远郊狂奔不已。好不容易速度调整到了有规律的晃荡，劈啪嘈杂、听不清说什么的广播开始报餐车的位置，还有乘务长请速至一等车厢，谢谢。

想寻找内心的平静是不可能了，2月银装素裹的风景也没能叫我分心。我的注意力转到了几乎不需要我操心的生意上。我的父亲在1919年创建了一家公司，旨在“促进普通人对音乐的欣赏”。它便是我一直在经营的这个公司的前身。它如日中天时，西蒙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家家户户的客厅里，除了韦奇伍德牌的茶具、霍恩比公司的玩具和罗伯逊牌果酱瓶里的盆栽蜘蛛抱蛋，也少不了西蒙兹的产品。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制作管弦乐名曲的钢琴改编版，包装上高贵的紫色封面，统一售价六便士。我们也出版表现著名作曲家日常生活的书籍、民歌专辑，以及在世的、没名气的作曲家谱的讨人

喜欢的新奇曲子。但西蒙兹的核心业务是音乐会这块：为所有的家庭策划音乐会之夜，上至老妪，下至蹒跚幼童，团体折扣价比看一场电影还便宜。

西蒙兹的办公场所紧靠摄政街一端的女王音乐厅，一周七天都忙碌不休，除了对艺术的热望，这里只有走投无路的大忙人和不挣钱的点子。窗子是从来不开的，唯恐冲淡了充满灵感的浊气。肘部打着补丁的钢琴师来讨尚未支付的报酬，推搡着穿过等待开场前买特价票的学生和工人。戴着呢帽的记者在隐蔽的角落里采访没有合法国籍的指挥家——有一次看起来像是在女厕所靠左手边的一小隔间里，水箱滴滴拉拉个不停，于是有闲来无事之人说那一晚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拍子之所以生硬，是因为西蒙兹卫生设备的毛病。

我父亲弯腰驼背地坐在一堆还没来得及看的合同和尚未修改的校样后面，无论何时都掌管着他的“音乐百货店”，很少在半夜前“打烊”。“这个地方不能没人管，”他会说。“谁知道下一个克莱斯勒^①什么时候就出现了呢？”早在敞开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诞生前的半个世纪，他就把他的门从铰链上卸了下来，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来来去去的人。只要是艺术家进来，他就会注意到。邮件越堆越多，秘书含泪辞职，可我父亲却能同时应付三个电话听筒，脾气还好得很，从来没有声音拔高的时候。

莫蒂默（犹太语中叫“末底改”）·西蒙兹兼具绅士的翩翩风度和学者的天马行空——尽管他既不是绅士，也不是学者。他十三岁就被送去“新闻界”工作，以支持在贝斯纳尔格林的守寡母亲和四个妹妹。在嘈杂声不断、夹杂着墨臭的报社，他善待新闻界的底层小兵，从校对人员一路爬到一本文学增刊的助理编辑，出入汉普斯特德的沙龙。那儿的战争期间，他遇见了我母亲，虽非真心实意，倒也娶了她。母亲是

^① 克莱斯勒（1875—1962），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

一个盎格鲁-西班牙犹太人家族——梅多拉家族的大女儿，带着嫁妆，有点儿邈遑。他们帮他开创了心仪的事业。他想涉足出版，在索姆河畔待了两年后，这个想法愈发强烈，可他找不到又能带给他审美上的满足、又能赚钱的书。1921年5月4日，他的朋友给了他一张女王音乐厅的门票，当时他的事业还全然没有方向，但这一天成为了他生命中每年都要庆祝的日子。表演小提琴独奏的是弗里兹·克雷斯勒，他八年没登台了。听他演奏维奥蒂波澜不惊的协奏曲，我父亲受到的感动超越了他从书所得。克雷斯勒胡子浓密，眼神明亮，惊艳的华彩乐段轻轻松松就流淌出来，听众们个个屏气凝神。“我被深深吸引，”我父亲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这么说。“就好像他只为我一个人演奏一样。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只为音乐。”

我父亲既不识谱也不会玩乐器，于是他请了个老师，告诉他四分音符和颤音之间的区别，教他音高关系在音乐会节目编排中的重要性。他经常去塞尔弗里奇公司百货商店后面的圣三一音乐学院听学生演奏，凭直觉就能嗅出才气。一个小提琴家是他从路边觅得的——那家伙当时在牛津大街卖艺。等凑齐了几个明日之星，他便在风神音乐厅（摄政街上一处看起来像教堂的地方）举办室内独奏会；有了新成立的伯明翰管弦乐队（晚上有车子送他们表演），他便在海德公园南端的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推出了首场面向家庭的音乐演出。

他的音乐会不邀请评论家，但音乐厅场场爆满，门票钱谁都掏得起。音乐界愤怒了，指责西蒙兹“降低了格调”。我父亲一笑而过，还把最贵的票打了五折。他拒绝加入合议委员会讨论单位成本、信用额度和对外国演奏者的准入控制。对音乐的诠释者、对带来光明和欢乐之人施加的任何限制，他一概反对。他尊敬艺术家，几乎毫无保留。

莫蒂默·西蒙兹从来不会要求名字里带三个“Z”的巴尔干钢琴师为了在英国有更好的接受度而换名字。也不会要求胖子歌手减肥。对于怯场的新手，他会给第二次机会；音乐会失败的时候，他只说自己的

不是。他没时间关注高档商品和打折传单，没空研究版权细节和娱乐税——得说一句，最没空关心的还要数老婆和儿子，他只能在周日的午餐时分看见他们，而且每次不是迟到早退，就是神游天外。

所以，冬天里的一个周日，当电话铃响起时（烤箱把烘牛肉烧焦了，母亲在为一些鸡毛小事嘀咕不休），我对父亲死在办公桌前的消息毫无反应——既没有歇斯底里，也不是冷静务实。父亲属于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不属于我；事实上，他死在岗位上，死在一堆未曾打开的邮件中。他那时六十一岁，和我现在的年纪一样。葬礼上，拉比^①提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他的谦逊和他自我贬低式的风趣。我却只希望他生前多和我们待一会儿。

我在剑桥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我开始管理公司，很快给它定了方向。对父亲这乱七八糟的烂摊子，我实施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带来亏损的、从没听说过的那帮子作曲的人——他们多是希特勒或斯大林时代的难民，被我一股脑儿送去了维也纳一家做现代音乐的出版商，有三个留下了，其余都卷铺盖走人。家庭音乐会结束了，独奏家去了竞争对手那里。两个出了名；剩下的要么结婚，要么教音乐去了，再要么在乐队打打下手，都没了消息。失去这些艺术家，我觉得挺可惜，因为他们对音乐的热爱颇具感染力，而他们的自负也永远那么逗乐。有些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有些连系个鞋带都不会，我不愿去想若是没了我们全天候的保护，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断开和这些人才的牵连，是出于我急迫的个人原因——听了医生和律师的建议，我努力避谈这个原因，也不让它变成白纸黑字。

我把办公室卖给了荷兰的一家商业银行，还卖了个好价钱，就给自己留了一小块地方，还有个名叫厄纳·温特的老处女文秘——她偶尔也装装嫩。迅速处置地产得来的钱花在了母亲身上。父亲死后，她一

^① 指犹太学者或神职人员。

言不发，在一家私立的精神病医院里接受定期护理。病情好转时，她还帮忙安排我认识她西班牙亲戚那瘦骨嶙峋的女儿莱特尔，然后一脸抑郁地参加了我们隆重的婚礼，再然后过量服用抗抑郁剂——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我永远都不知道，或者说不是很关心。

等我的改革一结束，公司剩下的就只有出版部门了，为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生产紫色封皮的廉价教学乐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让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扭亏为盈，能抵抗风险了。公司的业务量大大减少，少到它们永远不会要求我作出像父亲那样的牺牲——他是相当乐意的啦。

我的缺点会随时间暴露，但不足以损伤我圣人一般的声誉。我二十一岁时不曾知道的是，排除风险对企业而言并非好事。你得冒险试试看能不能成功，可对生活还不够了解的我，有的只是剑桥经济学家干巴巴的定理和受创心灵的过激反应。

很久之前，我卖掉的一个作曲家给一部好莱坞电影写了一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主题曲；另外一个家伙的歌剧登上了德国十五个城市的舞台。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弗拉基米尔·库兹涅索夫，被发现吊死在达尔斯顿区一间客卧两用房的灯具上。他的“侄子”兼室友——一个叫史蒂夫的街头小贩肯定地对我说，这个可怜虫的死和丢掉工作没什么关系，而是自个儿玩性爱实验不幸玩过了头。我后悔莫及，颇受打击，于是出资捐助了一个“库兹涅索夫奖”，算是纪念这个可怜的家伙。

西蒙兹家庭音乐会的这块虽然易主，可还和以前一样有声有色，吸引着平民百姓听他们喜欢的音乐，诱惑着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在没有评论家和文化舆论大鳄的地方试胆。我的退出，让竞争对手们发了财。

至于我们公司的根基——出版这头，我没预料到市场对乐谱需求的暴跌。广播和唱片像自来水一样，动一动手指就能有。它们严重摧毁了国内的音乐制作，催生了一大批的音乐文盲，以至于人们现在说到

“音乐演奏”，想到的是把录音带塞进汽车的仪表板。很少有人高兴费那个力气吹管乐器，去欣赏它的呜呜声；会在音乐会的过程中看袖珍乐谱的人就更是罕见了。学校里的孩子只会吹吹六音孔的玩具哨笛，敲敲垃圾桶的盖子，高雅点儿的就没人教了。所谓的“流行乐谱”还真是不流行呐。

唯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一息尚存的地方，才有乐谱的市场：为了周日的礼拜仪式而保留和训练唱诗班的教堂、周三晚上铜管乐队聚首练习工业时代早期传统曲目的社区礼堂，还有小镇和位于灌木林地的乡村——那儿的娃娃们还不会看书写字就会摆弄乐器，小青年们能在唱诗班排练的茶歇发现做爱是怎么回事。这些往往是王国上下最荒蛮的角落：在乌尔斯特的街道，教派间相互投弹有笛声相伴；在威尔士的丘陵农场，对位旋律和子身酗酒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亨伯河三角洲的渔港，鲑鱼已被捕捞绝迹，但拖捞船夫之歌却流传下来。

这些地方是西蒙兹最后的阵地了，是我直到退休或归西之前——不管哪个来得更早——都应该好好看护的遗产。我现在要去的就是这种地方，去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破烂地方。那儿的矿场关了门，造船厂废弃了，一片荒芜，但合唱团一年到头都在为圣诞节练习《弥赛亚》，煤矿小村一周会邀请乐队两次，最粗野的橄榄球阻截队员也能在酒吧的钢琴上弹点儿民谣，技艺虽不精湛，但毕竟是两手合奏，而且基本准确。排屋和面目全非、混凝土结构、地方政府建造的简易住宅那煤黑色的门牌后面，孩子们得先练习好音阶，才允许喝茶。行政部门草坪大院的电子门之外，音乐是社会等级战争的第一道防御线：“要是单亲妈妈带大的鼻涕虫凯莉也能拿到钢琴和小提琴的三级优秀，那我就要我们的夏洛特上复活节防艾滋音乐会大展身手。”玛格丽特·撒切尔镇压矿工时，音乐遭到了重创，然而，或许再也无法踏上工作岗位的男人们却仍会迫切地问我讨《小号志愿军》或合唱用的《以利亚》，而囊中羞涩得连吃饭也难的穷困的单身母亲们也不知怎么能掏出钱来买上一个中国制

造的、不入流的小提琴——这是我的小副业。

我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去，都会有人邀请我给已经报考了伦敦知名音乐院校或专业学院的考生当评委。我总会建议他们考虑下别的职业，因为走这条路最多也就是在不稳定的地方乐队做做幕后工作罢了。“什么都行，”妈妈们不屑一顾地说。“至少他不用像他爸爸那样去挖煤。”煤窑关了门，造船厂成了船坞，爸爸们沦为老来失业者，或在卑贱的服务行业当服务员或电话销售员，自那以后，那般的空洞论调就愈发泛滥了。在这些地方，真正的男人再也不会真正的工作了，劳动的尊严荡然无存。

眼尖手快的和头脑活络的早就开溜了。眼尖手快的投身职业体育界，头脑活络的去了摇滚乐团和古典音乐学校追逐音乐梦想。我马上要去的地方（它肯定和以前一样是个无名之地）从没出过明星，不过却为音乐大军贡献了众多的“步兵”：在歌剧管弦乐团里吹喇叭的男孩儿，在遥远的悉尼和新加坡拉中提琴的女人，更别提在众多的伴奏乐团里当键盘手的了。这里偶尔会出个芭蕾舞音乐指挥，间或也会有在神圣的宗教剧里唱女低音的。他们是牢靠的表演者，是音乐产业的灵魂和动力——勤勉用功战胜了灵感妙思。我佩服他们的决心，就好比渡渡鸟也许会 and 恐龙打打招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两种人举步维艰地逆行于时尚大潮中，注定要走向灭亡。

我驱赶着这些伤感的念头，听见一个印度旁遮普来的查票员拿着叽哇乱叫的扩音喇叭，操着声调怪异的英文报了我的站名——确切地说，不叫“报”，叫“叽里咕噜”。即将私有化的铁路开始管乘车的人叫“客人”，服务起来却像对待牛羊。于是穿戴利落的乘务员那清晰的吐字是再也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乡人含糊的咕哝。在现代英国，失去地位的并非只有挖矿这个职业。整个国家都无精打采，乱七八糟。连该死的德国佬也能给我们上上课。

我嚼着“卡姆拉德”牌镇定剂，抓着手提箱，磕磕碰碰地走下火车，